

# 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

梁碧莹

1847年1月4日,一艘来华运茶叶的美国商船从广州黄埔港扬帆返国。船上坐着三位免费搭乘者,他们是马礼逊学校的学生——黄宽、黄胜和容闳。这三位中国青年在其老师布朗(Samuel R. Brown)夫妇的带领下赴美读书。到了美国,他们就学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第二年年秋,黄胜因病回国。其余两位在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留美入读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黄宽远赴英国,入读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英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们所走的道路,从事的领域各有所异,但是,他们都从不同的领域致力于西学东渐。容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而黄宽和黄胜所作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其实,“二黄”对早期中外文化交流曾起过特殊作用,应当给予应有的地位。

## 一、致力于西医学传播的黄宽

黄宽走上了学医、从医的道路,以其精湛的医术治愈了众多病人,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成为近代中国留学归来的名西医,获得中外人士的爱戴和欢迎。尤其是他致力于把西医学传入中国,成为近代医学史上有贡献的人。

黄宽,字绰卿,号杰臣,广东香山东岸乡人。1829年出生,由于父母早亡,自幼跟随祖母一起生活,天赋敏慧,有“奇童”之称。11岁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堂,成为该校首期学生。据马礼逊教育协会记载,黄宽于1840年入学,中文姓名叫亚宽,英文姓名 Afun。<sup>①</sup>

马礼逊学堂是嫁接在中国土壤上的早期西式学校,为纪念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而设。该校由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外国商人捐资,由外国传教士出力筹办,1839年在澳门正式开学,1842年迁往香港。校长兼教师是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学校的课程中西合璧,以西学为主,包括近代西学知识、汉语和基督教教义,宗教课是主修课。其西学课程包括英语、历史、地理、算术、初等代数、力学、几何、天文、音乐等,也曾开过生物课和化学课。教科书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马礼逊学堂较为系统地教授西方近代知识,使学生获得从旧学堂里无法学到的新知识。学校对英语的训练尤为严格,学生一般经过三四年学习后,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能较为流利地读、写、听、讲,甚至有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令人惊讶,仿佛那些学生生来就说英语似的。当黄宽随布朗先生赴美时,已在马礼逊学堂学习了近6年之久,打下了英语基础,受到了西学的启蒙。

1847年,18岁的黄宽和他的同学容闳、黄胜跟随布朗夫妇赴美,共同就读于麻省的孟松学校。当时美国尚无高级中学,只有预备学校,而孟松学校是预备学校中最著名者,全美国好学之士也远道而来求学,作为入大学的预备。是时中国人入孟松学校者,只有这三位学生。该校校长“对于中国素抱热诚”,对容闳等“特加礼遇”,希望他们学

成归国 能有所建树。

在香港的英美商界人士资助这三位中国学生留美就读的经费，为期两年，1849年必须回国。1948年秋，黄胜因病提前回国。两年将逝，容闳、黄宽均想继续深造，但苦于经费无着落。后来还是孟松学校的海门（Charles Hammond）校长和布朗先生伸出热情之手，写信询问在香港的资助者。不久，他们得到答复：如若容闳、黄宽二人愿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专科，可继续资助。友好人士的盛情，感动了两位中国青年。容闳写道：资助者“其慷慨解囊，历久不倦，诚为可感”。<sup>②</sup>黄宽表示愿意前往英国读书，容闳另谋办法，日后入读美国耶鲁大学。1850年夏，黄宽和容闳在孟松学校毕业。黄宽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系。从马礼逊学堂到孟松学校，这对同窗十载的老同学，这次分别，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大学，该校的医学院颇负盛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医学院就读。美国一些青年也远道而来学习，美国一些著名医学院教师也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黄宽在这所设备齐全、质量高且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攻读医科，是中国留学欧洲学习医科的第一人。经过5年的艰苦学习，毕业考试获第三名，并获金牌奖和医学士。1856—1857年，黄宽在英国的医院里实习两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医学博士，成为华人留学外国全面掌握西医学科领取医学证书的第一人。

这时，爱丁堡大学出现一股“医学传教”热潮，并组织爱丁堡医学传道会，准备派传教医生前往叙利亚、中国等亚洲国家，通过医术达到传教的目的。黄宽一方面受医学传教的影响，更重要是希望回到祖国把学到的医术救治更多的同胞。1857年，黄宽以伦敦会传教医生身份返国，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他的身份使他在医务界拥有和西方传教医生同样的权益，可以开设私人诊所，收治病人。

回国后的黄宽通过在西医院行医，直接推进西医在华的传播。1858年，他到了广州，先在广州府学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悬壶治病，接着又接办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医生在广州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局。合信主持的惠爱医院有50张病床，合信等人还一面编译西方医学著作，一面又组织训练班，培养少数中国青年充任医生的助手。该院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遭到破坏。黄宽接管后医院得到发展，医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院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5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还亲授生徒4人，助理诊务。<sup>③</sup>1860年，黄宽因个人原因离开惠爱医局。

1862年，黄宽应李鸿章的邀请，赴天津任医官，但他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半年后辞职回广州继续行医。丁日昌很器重他，劝他出任医官，走仕宦之途，他始终没有接受。<sup>④</sup>1863年，中国海关医务处成立，内设海关医务官，其职责除负责海关职员的医疗保健外，主要承担对港口进出的船只进行检疫。当船上缺乏医生时，医务官还要照顾和治疗患病的船员。黄宽被聘为首批医务官，负责广州地区医事工作。在首任17名医务官中，唯有黄宽是华人。<sup>⑤</sup>可见，当时他颇有名气，其医术亦受在华外国医生的认同和欢迎。

在黄宽接管惠爱医局的同时，他又在博济医院兼职，与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 Kerr）合作，后来又在博济医院服务达十年之久。当嘉约翰因病离华，其院长一职由黄宽代理。黄宽在主持医院事务时，博济医院发展很快。医院所施手术次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他在医务上的地位愈显重要。黄宽医术精深，尤擅长外科，诊断精细，手术灵敏。1860年，他曾施行胚胎截除术（碎胎术），为国内首创。广东地区以患膀胱石病人多，嘉约翰时以作截石术闻名，但在他之前，黄宽早已割治过33人。<sup>⑥</sup>据统计，他做过三千多次膀胱结石手术。

除了主刀行医外，黄宽还积极致力于培养西医人才。他曾在自设的诊所内培养训练了4名中国学徒，中国人教授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由此开始，西医传播不再为外国传教医生和外国医生独擅。1866年，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黄宽被聘为教员，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这些都是他在英国时主攻的科目，加上积累不少临床经验，他的教学很受欢迎。为了帮助学生直观地了解人体结构，黄宽还以尸体作解剖示教，使学生知识水平提高较快，医校学生不断增多。

黄宽醉心于临床诊治和教学，加上英年早逝，故无太多著述问世。1873年，广州地区霍乱流行，他著文评论真假霍乱的区别。他兼任广东粤海关的医官时，每年要写一份详细的有关当地病情的报告，上交海关总税务司，集为《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版。黄宽汇集的关于牛痘和霍乱发病情况的报告，颇受人们重视。他倾其全力于医疗事业，达到呕心沥血的程度，久而久之，积劳成疾。1878年10月，黄宽患颈项庸疽。正在这时，英国驻华领事夫人难产，求他出诊，家人再三劝阻，他对家人说，如果他因病致死，只损一人，但如果产妇难产，必定损失两命。最后他坚持出诊，孕妇产后平安，而黄宽归家后项疽突发，于10月2日去世，享年49岁。

作为西医学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黄宽在医学界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他服务于中国医务界20年，终日沉浸在繁忙的诊疗、教学中，在医学领域里默默辛勤奉献。他以精湛的医术、渊博的学识传遍远东，获得“好望角以东著名外科医生”的美称，深得中国人的爱戴和西方同行的称誉。他又是中国人在华传播西医学的第一人，其地位不容忽视。他的同学容闳非常准确地评价他说：“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继复寓粤，事业益盛，声誉益隆。旅粤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士有加，积资亦富，于1878年逝世。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悼惜，盖其品行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sup>⑦</sup>曾与黄宽在医务上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嘉约翰医生对黄宽的去世也感叹不已，他认为，黄宽称得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榜样。

## 二、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的先驱黄胜

黄胜（1825—1902年），名达权，号平甫，胜，是其小名，广东香山县人。黄胜自美国归国后，从事过出版、翻译、教学等工作，在西学东渐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说，他“虽然始于翻译，也仅止于翻译，但由此可知他是愿意为中国的近代化尽一分心力的”。<sup>⑧</sup>

黄胜世居澳门附近，1841年1月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就读。入学时15岁，中文姓名叫亚胜，英文姓名Ashing。他入学时，该校已有学生5名：亚根、亚运、亚闳（即容闳）、亚杰、亚宽（即黄宽）。黄胜是赴美三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到美一年后，得病不得不于1848年秋回国。虽然在美国时间较短，但一年多的美国生活和六年的马礼逊学堂学习，使他有了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和西方文化知识。

美国孟松学校的校长海门是位大教育家，“德高望重，品学兼优”，擅长英国文学，尤其爱好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他注意教学法，善于演讲，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每日登堂授课，不仅仅讲文法的规则，还对词句之构造及精义所在，都解释得很详细。在他的教导下，学生都阅读过许多英国文集。黄胜经过这样的训练，不仅增长更多的英国文学知识，而且也为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胜回国后，在香港（中国日报）（The China Mail 又称德臣西报）从事印刷工作。该报主笔蓄德鲁特（Andrew Shortrede）是他赴美的资助人之一，他“慷慨明决，有当仁不让之风”<sup>①</sup>。不久，黄胜在英华书院印刷所从事印书工作。英华书院是马礼逊在1818年创办，原设在马六甲，后迁往香港，院长由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担任。该院的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sup>②</sup>。为配合传教和教学，该院的印刷所将《圣经》译为中文，广为印刷，也印一些沟通语言的工具书和中文典籍的英译本，在客观上起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黄胜对这份工作较为满意，虽然每月工资只有30元，他仍然安心工作，香港法院曾以每月120元的高薪聘他为翻译，但他不为所动。

1858年，理雅各在英商资助下，计划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建设计划。黄胜一方面从事印刷出版业务，一方面帮助理雅各将“四书”译成英文。在王韬1862年来港之前，黄胜是理雅各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唯一助手。由于黄胜中文、英文皆通，帮助理雅各解决了许多困难，并校对出许多不应有的错误，是个得力的助手。在黄胜的帮助下，“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翻译已完成，名为《中国经典》第1卷和第2卷，并于1861年开始出版问世。理雅各在高兴和激动之时，不忘向黄胜表示深深的谢意：“译者仅向其好友、教会印刷所主管黄胜君衷诚致谢，惟君之精通英语，始能称校核之职也”<sup>③</sup>。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清政府中办洋务的官员开始重视洋务人才。在黄胜的老同学黄宽的推荐下，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江南制造局总办丁日昌，邀请黄胜前往上海协办洋务事业。黄胜一时不能前往，托王韬致函李和丁，并把自己翻译的《火器略说》寄去，信中谈及该书是“译自西书，间参管见”，翻译枪炮制造这一内容是基于：当时西人在中国翻译格致之书，包括天文、算术、舆地和医学等，“独于制器造炮一事未及一言”<sup>④</sup>。王韬于1882年刊印《火器略说》时写道：“此书甫成，余即缮录真本上呈丰顺丁大中丞，中丞击节叹赏”<sup>⑤</sup>。足见丁日昌对该翻译的赞誉。

不久，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后来又升为江苏巡抚。1869年，丁日昌再次邀黄胜到上海助其一臂之力，黄胜在上海只停留两个月即回香港。次年，丁日昌又邀他到上海，负责翻译西方地理书籍。黄胜再次托王韬代函，婉言谢绝。推辞的理由是要还乡侍奉年迈的母亲，实际上还有重要的原因，即黄胜深知翻译西书并非易事，“选例必严，取材必富，摭言必雅，立体必纯”，非略懂语言文字就能胜任。他谦虚地表示，自己“才不足为世用，学不足为众式”，担心不能胜任。黄胜在上丁日昌书中，推荐了王韬，指出《火器略说》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王韬加以润色并发表意见。黄胜认为，王韬虽未能深究英文，但见识广，才思敏捷，能纵横议论，是个人才。丁日昌由此知道王韬，并加以重用。

黄胜从事过两年多的教学工作，为培养西学人才尽过力。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被邀为英文教习，半年后由黄胜继任。黄胜从1864年8月至1867年初任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上海广方言馆是上海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第一届学生张德彝曾记载1866年10月8日访问广方言馆的情形，他说：“此馆系官设，又名贡西文馆，内分三馆。提调额设一员，姓叶名承铎字秋萍，汉教习额设三名；英文教习额设一名，姓黄名达权字平甫，系广东人，能英文，曾往来合众国六载”<sup>⑥</sup>。他的学生有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如首批学生之一的汪凤藻，1868年被选送京师同文馆，几年后任副教习，1891年至1894年为出使日本大臣，后任上海南洋

公学校长。席淦，先在京师同文馆任算学副教习，1866年升任教习，任教近30年，成为继李善兰之后最有名的算学教习。严良勋在校时已和外交教习合译西书，他译的《四裔编年表》，以年表体例编辑各国帝王、总统年代，被时人认为是了解世界各国缔造、变革、种族、政教和战争的必读书。70年代，严良勋在广方言馆任教，后任福建知府。

出版事业是黄胜在西学东渐中贡献较大的一项工作。在人生旅途中，黄胜在印刷和出版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1853年8月，由马礼逊教育协会资助，英华书院印刷的《遐迩贯珍》创刊。<sup>⑤</sup>这是鸦片战争后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先后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奚礼尔（C. B. Hillier）和理雅各担任主编，实际事务主要由中国学者黄胜负责，举凡中文撰稿、英文翻译、报馆总务，均由黄胜经理。<sup>⑥</sup>该报为月刊，每期印刷3000份，每份售价为15文钱。1856年5月因主办人事务纷繁而停刊，共出33期。该报虽然只办了近3年时间，但它使中国近代报刊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遐迩贯珍》每期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占2/3以上的篇幅，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和介绍是该刊的另一重要内容，最后才是宗教。在刊物的装帧方面，以中国线装书的版式出现。该刊首先登载新闻图片，是近代中国新闻业之一大贡献。

从19世纪50年代起，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其中，《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始为两日刊，后改日刊，篇幅很小，每天只出一小张，这是我国日报最早的一种。关于该刊创刊时的主编，一向认为是伍廷芳，也有说是黄胜。<sup>⑦</sup>当时黄胜35岁，已有相当出版印刷经验，完全有此可能。《中外新报》与香港《刺报》（Daily Press）有密切关系，因而有人认为它是英文《刺报》的中文版。其实，《中外新报》“名为《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sup>⑧</sup>两者的关系是，《中外新报》“订借”了《刺报》用过的一套旧的中文铅字，<sup>⑨</sup>它和《刺报》仅仅是“月纳印费”，自负盈亏的租赁关系。无论其主编是伍廷芳也好，黄胜也好，都是华人所办的我国第一份日报。

另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日报——《华字日报》创刊于1864年。<sup>⑩</sup>创办人陈霭亭。初创时篇幅甚小，内容主要翻译西报和转载京报。该报向教会购得旧铅字一副，由陈氏任主编，由英文《德臣报》印刷发行。该报是香港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先后担任主笔的有黄胜、王韬、潘兰史、赖文山、林子虬等人。<sup>⑪</sup>黄胜和他的朋友王韬积极为该报撰稿。《申报》在介绍《华字日报》时，曾经特别提到他们，说：“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巽志夫虞初而已也”<sup>⑫</sup>。

1871年，英华书院因故停办，所属印刷所的设备全部变卖。印刷所的部分机器被总理衙门购下，提供给京师同文馆作为印书之用，由黄胜亲自将机器押送到北京。余下大部分机器由黄胜和王韬联合买下，在香港设立一所专营印刷业的《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初开业。该局以最先进设备排印图书，他们承印的有王韬的《普法战纪》、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英粤字典》和邝其照的《华英字典》等<sup>⑬</sup>。这些书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华印书总局一直在筹办编印日报，这就是1874年1月5日创刊的《循环日报》。由于黄胜在1873年5月前已离开香港，因而没有参与《循环日报》的活动。

作为留学生的黄胜也曾协助容闳推进“留美教育计划”，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出过力。黄胜曾任留美幼童肄业局的委员，1873年6月12日率领第二批幼童30名赴美，

香港、上海7名自费留美学生同行。以后，黄胜一度回国。1877年年初，奉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的委托，黄胜与唐廷枢（马礼逊学堂的同学，原名杰）前往香港，招收公立学校的优秀学生40名，转入福州船政学堂的后学堂——英国学堂。由于这批学生成绩出色，以后船政局每年继续在香港招生。1878年黄胜第三次赴美，任清廷驻美使馆的翻译，但是，清政府驻美公使陈兰彬对他的印象不好。1879年，出洋肄业局的帮办空缺，容宏提出让黄胜接任，陈认为黄胜“洋习太重，在局究不相宜”，改调他到金山总领事馆任翻译。国内又有人奏他暗诱幼童入教。黄胜工作得很不愉快，不久便回到香港。<sup>④</sup>

在香港，黄胜的知名度很高。1858年任香港法院的第一位华人陪审员，1870年任东华医院的董事。1883年加入英国籍，次年被香港总督宝云（George Bowen）提名为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是继伍廷芳后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二位华人。1902年去世，享年77岁。

黄胜的一生，从事过出版、翻译和教学等工作，致力于西学传播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虽然他没有容闳那样出名，但他从事的洋务事业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有过独特的贡献，也因而被称为“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的先驱”、“近代中文报业先驱”。

#### 注释：

①《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2卷（1843年12月），第623页。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③王吉民：《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号。

④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93页。

⑤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递》，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⑥《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号。

⑦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8页。

⑧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1985年版，第266页。

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页。

⑩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刷馆1985年版，第203页。

⑪陈学森：《黄胜——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之先驱》，《崇基学报》第3卷第2期。

⑫王韬：《园尺牋》卷7，第10页。

⑬王韬：《火器略说》卷末，“再跋”。

⑭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45页。

⑮该刊的出版日期，黄瑚作过考证，创刊于1853年8月1日，每月1日出版，至1856年5月1日终刊。见黄瑚：《“遐邇贯珍”介绍》，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⑯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⑰前者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73页；后者见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略》，第68~79页。

⑱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3~74页。

⑲麦思源：《七十年来之香港报业》，《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

⑳中国的报史学者一般认为该报创于1864年，但欧美部分报史研究家提出1872年创刊说，见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第30~36页。

㉑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㉒《申报》1872年5月8日。

㉓《中华印务总局告白》，《香港华字日报》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十（1873年6月4日）。

㉔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第265页。

▲梁碧莹 中山大学历史系 教授

（责任编辑 江中孝）